

贺龙与“男篮5号”

□ 江波

1991年4月9日上午10时,在重庆大田湾体育馆前的街心花园,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贺龙与运动员站在一起》群雕落成揭幕典礼。原“战斗体工队”的200余位战友,特地从全国各地赶赴山城来参加这次盛会。

这座6米高的群雕用40多立方汉源红花岗石凿成,座上雕刻有杨尚昆同志的题字。贺老总右手拿草帽、左手握烟斗与5个运动员在一起。作为曾在贺龙身边呆过的运动员们,仰望雕像,禁不住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他们知道这座群雕人像中除贺龙同志是真实人物之外,另外5位运动员应该是众多体育项目的概括。但从运动员们的感情上来说,除贺老总之外,倾注最多的便是与老总稍后并立的男篮运动员——他的背心上有个“5”号。

1949年8月28日,贺龙在西北战场上为了牵制国民党胡宗南军队于陕南地区,他指挥18兵团发起秦岭战役。同年9月中旬,贺龙赴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他赴北平时吩咐战斗剧社随后也赶到北平去,代表第一野战军全体指战员为到会代表汇报演出。其实,贺龙带到北平去的并不只是一个剧社,剧社里还有一个战斗男子篮球队,既是球员又是演员,白天打球、晚上演戏,把活跃部队文化生活、鼓舞斗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开展体育运动、增强指战员体质结合起来。实事求是的说,这时的战斗剧社确是比抗日战争时期更为壮大和提高了,而战斗男篮却大不如1940年,在晋西北120师时拥有如刘卓甫、邢亮、王延弼、张之槐等人的战斗力。贺龙眼见新中国成立在即,今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任务任重道远。为此,他早就有准备充实体育骨干,把战斗男篮扩大,从剧社中拉出来成立专业体育工作队,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打算。所以,这次叫战斗剧社到北平去,除了演出,另一个任务就是从赛场上发掘体育人才,把他们集中到部队中来,让他们为推动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贺龙还不止一次谈到在120师时,很多人不理解他把已经在冀中深县任县长的刘卓甫同志要到战斗队来的事。他说,在当时共产党里能胜任县长的人多的是,而要找一个人如刘卓甫这样的国手却难。刘卓甫深感贺师长之爱才,欣然前往120师报到。

当时战斗剧社的领导心中有数,在北平的日子里便是晚上演出,白天四处找兄弟单位踢球以发现人才。可是,打了好几场球却无所获。正感到贺龙交代的任务难以完成之时,有人介绍在宣武门外的华北大学三部,集中了1000多名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可能会从中发现体育人才。于是“战斗”找上门去与华大三部进行了一场男子篮球友谊赛。结果是76比83。但战斗队虽败犹喜,他们在比赛中发现“华大”有个小伙子,其单手翻身投篮令人防不胜防,命中率、速度快、弹跳好,这不正是自己所要物色的对象吗?当晚,“战斗”领队即把已发现人才之事向贺龙汇报。贺龙指示:这事不可操之过急。事隔一日,“战斗”又

去华大三部踢球,当确认这个小伙子的球艺确属上乘之后,便派人去联系请其支援调人之事。哪知对方回答,华北大学学生是为华北地区培养的革命干部,没有向外地输送人才的任务,要调出外区,须经政务院同意。

贺龙本是一个求才如渴的人,特别是正欲广集人才、憧憬振兴中华体育事业之际,要一个在体育上富有才华的人而不可得时,心中不免闷闷不乐。是时,作为已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主席团成员的贺龙,正有一个会议要参加,贺龙怀着这种心情早早来到会议室等待开会,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埋头抽烟,连周恩来进来他也未发觉。周恩来发现这一情况,便轻轻地走过去同贺龙打招呼。贺龙心中有事的样子早被周恩来看在眼里,一定要追问有啥了不得的事会使这位“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不高兴。贺龙虽然想到为了一个学生的分配,也犯不着去惊动即将上任的政务院总理,但还是将受人受阻之事讲了。周恩来听罢,爽朗地笑了,大声地说:“这是华北大学办事的人不对,你贺老总总要个学生都不给,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就向他要人。”转身向不远处吴玉章招手并说:“吴老,贺老总向你借个学生,看你这个校长给不给?”吴玉章此时已71岁高龄,早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就任过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同贺龙也是老相识了。听完前因后果,吴老笑道:“发展体育事业是好事嘛。”立即从电话上通知华大主持日常校务的领导说:“西北一野来学校要人,要多少给多少,西北尚未完全解放,我们有责任从干部、人才上支持他们。贺龙点名要的那个小伙子,马上让他去战斗剧社报到。”回过头来对贺龙说:“老总,你马上要解放四川,我把华北大学的人给你,也是为我的家乡输送人才哟!”说得大家笑了。

于是,1949年9月26日上午,年方20岁、身高1.75米(当时算高个子)、从天津考入华北大学音乐系的学生,被接到当时住在北平西斜街花园饭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斗剧社,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5天光荣参军。他就是在剧社军管乐队吹奏小号、在战斗男篮打前锋、穿“5号”背心的孙传乃。

战斗剧社于1949年9月27日便离开北平,徒步行军踏上了返回西安的漫漫归途,经河北石家庄,山西太原、洪洞,走到临汾正是10月1日。当听到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后,剧社的同志们欣喜若狂,决定以下午5时的一场球赛和晚上的演出来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这场球赛不仅要写入“战斗体工队队史”,也应该记入新中国体育史。作为参赛的“5号”来说,这是他献身新中国体育业的起跑线。

一路风尘行军,战斗剧社返回西安。1949年底,又随贺龙率领的解放大军来到成都。

1950年2月4日,贺龙来到重庆西南军区后,指示将一野的战斗剧社与二野的文工团合并为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战斗男子篮球队虽然吸收了一些新的成员,并已有专业化发展的趋势,但仍属文工团建制之内。

1951年4月下旬,战斗男子篮球队已是一个专业队,肩负起对外代表西南军区,对内开展全区广大指战员体育活动的历史使命。孙传乃入选,仍穿5号球衣。

1955年5月,“5号”从重庆来到成都北较场,任成都军区体工队男子篮球教练,他仍然是穿着5号球衣并在需要时上场参赛。1959年初夏,贺龙到西南视察,军区特以一场男子篮球赛来欢迎。当他见到孙传乃也在场上时,高兴地对陪同人员说:“看!那个5号,是我从华北大学要来的,是战斗队的小老虎。”因此,还衍生出当年战斗队男篮有“五虎上将”之说,“5号”则为其一。

1969年底,军区体工队奉命解散,这位从共和国诞生之日起就与篮球结伴的5号孙传乃转业到军区后勤部下属的7436厂。工厂的篮球爱好者感谢孙传乃仍穿上5号球衣,加盟他们的业余篮球队当教练,而他的本职工作却是该厂仅有300多个学生的子弟小学体育教员。他的面前再也没有专业的队员、灯光球场和教练的单人宿舍,而是一群被昵称为“泥猴”的小学生、下雨就稀稀糊糊的土球场、单身汉集体宿舍,地方小学教员的工资也较部队专职教练少了一半……从物质方面“5号”失去了许多,但从精神上来看,孙传乃淡泊名利,对贺老总要富国强民的教诲却牢记在心,他在这个小学,一干就是20年。

1973年是孙传乃任教的第2个年头,他训练的第一批学生就获得了“成都市小学生女篮亚军”。之后,这个学校命名为“山鹿”的两支学生球队拿下冠军16次、亚军14次、季军4次,体育道德风尚奖3次。其间,1984年“山鹿”男学生在孙传乃的率领下代表四川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重点省、市小学生篮球赛,被评为“精神文明运动队”。

1986年底,国家体委授予这个子弟小学体育老师孙传乃“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的光荣称号。1987年2月,《四川日报》记者专程前往采访孙传乃。在他离休后的1990年“教师节”之后,成都广播电台播出了《人生的价值在奉献中闪光——记原成都军区男篮教练孙传乃在厂办子弟校执教20年》专稿。

“5号”孙传乃虽与篮球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他的生活却并不单调。他练硬笔书法,写小诗。他还爱好音乐,不但有极高的欣赏水平,还能作词、谱曲和演奏多种乐器,他那一首《夏训之歌》就在队员中传唱至今。他还常与文友们聚首对弈、谈诗论文,不仅如此,他的家庭也很和睦。

群雕的作者余副教授曾说,作品中的“5号”“实际上是一个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典型人物。”而作为当年“战斗”的运动员们,却相信这一定就是老孙。的确“战斗5号”给大家的印象太深了。

1933年5月有一支抗日部队从山西汾阳军校开拔,奔赴察北,痛击日本侵略军,这就是由汾阳军校师生为骨干扩编成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一军第二师。行进队伍中有两名高陵籍军校学员耿宏道和张怀忠,他们心连心肩并肩,走上了抗日道路。

耿宏道(1911—1995),高陵耿镇东村人,出身书香门第。1926年11月加入国民联军,参加西安解围战斗。西安光复后,被派遣到国民二军,驻扎在眉县长成师管区耿志介团受训。先在特务连搞勤杂,后转入军官教导队,磨练3年后,以第六名优异成绩被汾阳军校录取,编入第一大第五中队。张怀忠(1915—1980),高陵崇皇街办徐吾村人。1929年,经姐夫何崇萧介绍到山西汾阳军校学习,编入第一大第七中队。两名同乡,经历坎坷,相逢汾阳军校,双手紧握一起。从进校之日起,他们便立志,苦练杀敌本领,将来为国效力。

汾阳军校前身是由冯玉祥领导的国民联军创建,又称西北军事政治学校。该校党组织是1926年李大钊派人组建,邓希贤(小平)任该校政治部主任兼中共组织书记。在军校两人建立了深厚情谊,一起学习,共同训练,接受新思想,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军校派他们去北平、上海等地购买了不少思想进步读物,并在文庙开办了“汾阳图书馆”。

1931年春,汾阳军校地下党组织经中共汾阳县委书记王森与省委书记刘天章接上关系,改称中共汾阳军事工作委员会。军校地下党组织在汾阳3年时间里,秘密发展200多名党员,在各学生队、军官队和教员中都建立了支部,并积极扩大到地方。1932年,中共华北特委先后派王蒂南、高雅风来军校工作,组成汾阳地区工作委员会。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耿、张二人思想进步很快,强烈要求加入中共党组织。经组织严格审查,于1932年8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党组织以后,两人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在城内广场西北角组织召开了3000多人“军民抗日反蒋大会”并发表演说。鉴于两人工作出色且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党组织任命张怀忠同志为一大队七中队党支部书记,耿宏道同志为一大队五中队党支部宣传委员。

1933年5月26日,各地抗日部队10万余众抵达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张慕陶为政治部主任。由汾阳军校学员扩编而成的第二师属同盟军劲旅,党组织决定遴选各科成绩优秀、思想进步、作战英勇的20余人,担任连长。该师下辖三个团,一团团长尹心田,二团团长贾振中,三团团长周茂兰,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耿、张分别被委派到二团和一团担任连长。他们身先士卒,率先报名参加敢死队,始终战斗在最前沿。

同年6月22日,同盟军向察哈尔和热河的日本军队发起进攻,相继收复康保、沽源、宝昌等地。7月7日夜至8日拂晓,同盟军分多路向多伦外围阵地发动进攻,敢死队员在强龙光带领下,匍匐前进,连克三道外围防线,直抵城下,冒着枪林弹雨和敌机的狂轰滥炸,率先攻上城楼,与敌人巷战肉搏3个多小时。日军逐渐不支,从东门向经棚方向逃遁,多伦得以光复。进城后,强龙光在冲锋中不幸被敌人炮火击中,壮烈牺牲,战后连尸体也无法找到,成为“有文字记载牺牲在抗日前线的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工农红军将领”。

由于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抗日同盟军失败并大部被解散和收编。8月24日,特委在张北二泉井村召开会议,决定将军校中的党员划分为若干小组分散于各地从事地下工作。分别时,耿、张二人与同宿舍战友霍昭汉(张方舟,开国少将)畅谈一夜,耿还赠送了一枚子弹未穿透的银元作为留念。

1934年春,两人回到西安。根据党组织安排,耿宏道同志利用西北军关系,在十七路军中从事兵运工作。先在十七路军长安县兵役站任站长,后经冯玉祥推荐进入西安警备司令部任新兵大队队长(营级),在青年军人中宣传进步思想,秘密发展党组织。抗战全面爆发后十七路军改编为三十八军参加抗战,称为“中条山铁柱子”。解放战争中和平起义,编入西北野战军,毛主席评价:“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

张怀忠回到西安后,根据省委指示和安排,积极投入到农民运动中去,组织参加了“周户暴动”。后由于叛徒告密,行动失败,隐匿秦岭山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经张宗逊(开国上将)介绍二次入党,继续秘密为党工作。抗战后被党组织保送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马列教研室主任。解放后任西安市公安局保卫处侦察科长,从事剿匪反特工作。



抗日同盟军中的高陵人

□ 耿烈

老成都百年酱园“太和号”记趣

□ 王淼

胡璧珊看架势不好,连忙鸣金收兵,把其余门市都撤了,只守正府街老营,并把招牌改为“易乾号”免得打眼。幸好市民对太和号印象太深,虽说撤了门市,换了招牌,生意却依然如故。这时,胡璧珊考虑到胡叔樵已长大成人,就征得胡子康的同意,让其子胡叔樵遵从祖训当3年学徒,并在1933年满师后接管了太和号。不久二刘战争结束,刘湘统一了四川,防区撤销,胡叔樵认为世态“清平”,就依旧将招牌恢复为太和号。

谁知,胡叔樵一接过太和号便碰到烫手的事。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实行食盐统销。当时,胡叔樵是成都酱园同业公会理事长,每月都得将会员户下月用盐量造表报盐管局审批。盐管局把持审批的科、股长周乃福、邹汝贤、蒋怀桂等照例收包袱不说,

还只批一半。这几个被称为“牙齿吃黄了的‘人精’”,下面耳目众多,把全城大一点的酱园的用盐量摸得清清楚楚,你想多报点也不行。酱园没法,只好到九眼桥码头的黑市场上去买“私盐”。明眼人都知道,所谓私盐不过是官盐私销的把戏而已。一般酱园被卡住了,而胡叔樵倒还稳得起,因为太和号食盐库存常年保持在七八万斤,故胡家的人说:“就是三年不进盐,太和号照样出酱油。”然而,没想到,这同太和号仍然是大梦难醒碰到了翘扁担。

原来盐管局成立了查缉组,由徐城带领一帮人满城查缉私盐。太和号数万斤食盐被当成“私盐”全部封存。胡叔樵连忙央人去找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长蒋浩澄。蒋是同声社社长,吃铁吐火扇秤砣的歪人。蒋满口答应帮忙。但有一条,胡叔樵得加入同

声社。蒋是要把肥肉装进自己的罐罐,胡叔樵明知其用心,还是一口应承了。因为埋起脑袋孝敬几个有限的尊神,总比伸起颈项到处让人砍“槽头”合算。果然,胡叔樵花钱在同声社捐了个一步登天的袍哥大爷之后,盐管局再也不敢找他的麻烦了。

胡叔樵有了靠山,却逗发了官瘾,想当市参议员。经过一场“竞选”,胡叔樵连闯三关,花去120两黄金,终于买了顶市参议员的乌纱帽,其父胡子康也当选为成都县参议员。太和号双喜临门,当然大排筵宴,酬宾谢客。而竞选失败的徐仲琳恶气难消,就趁机撰上一联,讥讽胡氏父子:父参议,子参议,父子参议;红酱油,白酱油,红白酱油。

从红白酱油中捞出个父子参议,也算真是民国年间一樁趣事。

这时的胡叔樵与太和号前两代的主持者不同,他是二房之后,享有主权,而且又相继承了袍哥、参议,自然气度不同。曾在胡子康手下当过学徒的老伙计说:“胡子康父子忘记一件竹布衫要穿十年的事了。”胡叔樵手头的资产,不连田产,仅太和号也近十五万元。他再也不满足偏安,想利用他的社会关系,搞一个酱园“托拉斯”。于是,他又在棉花街开了一个“益生号”,北大街开了一个“厚生号”,虽说这两处都是合伙经营,但因为他投资过半,实际上完全受他控制。另外,他还筹划在西门和南门再开两处酱园,以太和号为中心,来一个五酱园称霸成都。只是因为濒临解放,人思新政,这个梦才没做成。

凡120年的老号酱园也就寿终了。

(连载四·全文完)

·丝路文史·

